



# 风云 人物采访记

全译本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 著

新华出版社

# 风云人物采访记

全译本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 著

嵇书佩 乐华 杨顺祥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风云人物采访记(全译本)**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 著  
嵇书佩、乐华、杨顺祥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350×1168毫米 32开本 22.75印张 插页2张 521,000字  
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150册

ISBN 7-5011-0157-4/G·40

统一书号：7203·215 定价：6.00元

## 译者的话

《风云人物采访记》一、二集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为此我们将原书《采访历史》中法拉奇对其他八个人物的采访记录也译成中文，并按原书的次序介绍给读者以保持本书的完整性。为照顾读者的习惯，书名仍定为《风云人物采访记》。

本书作者法拉奇是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她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并以提问尖锐，言辞泼辣著称。因此她的人物访问记别具一格。

法拉奇习惯于用录音机录下访问中的全部问答，然后一字不漏地以原对话形式全文加以发表，但加上一个占一定篇幅的前言。她说这样才能做到真实，避免断章取义。一个有经验的记者为了表明自己的“客观公正”，常常要努力在他报道的内容中倾注自己的观点，而在形式上尽量隐蔽自己的观点。法拉奇在这方面的努力有她自己的特色。她以公布问答全文的形式来表明她的客观公正，其实，这并没有妨碍她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相反，尽管她没有修改或删除被访者的谈话，哪怕是一个字，但她却通过她的提问，尤其通过每一篇的前言尽意地表达了她的观点，包括她对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问题，甚至对一个国家或政党的前途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的立场和理解，还包括她对被访者本人的

看法。

我们翻译此书是为了向读者介绍一种采访风格；至于作者和被访者的爱憎和好恶，谅读者自有见解。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高级编辑陈葶的热情帮助，在此谨向他致谢。

1987年8月

## 原著序言

我编这本书的唯一目的是，希望它成为当代 26 位政治名流的历史的直接见证，成为一部新闻报道的集子或历史文献。但我不希望它沦为了一本仅供那些研究权力之争的学者们阅读的采访集。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把自己当作一架只是机械地记录所见所闻的机器。我进行每一次采访都费了心血，象对待那些与我利害攸关，我必须态度明朗的事情那样去关注我的所见所闻（事实上我对每件事情都根据我所持的道德标准明确表态）。我不是带着象解剖学家或记者所持的超然态度去会见这 26 位大人物的。我去见他们时往往情绪激动并带去了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我在访问他们之前总是先向自己提出。我进行这些采访的目的是希望弄明白他们在掌权时和不掌权时是怎样左右我们的命运的。我要弄明白诸如这样一些问题：历史究竟是多数人创造的，还是少数人创造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还是取决于个别几个人？

我知道这是一个没有人解答过，也永远没有人能解答的老问题，也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十分危险的陷阱，因为每一个答案的本身都包含着矛盾。难怪很多人妥协了，他们说：历史是由所有的人 and 个别人创造的，个别人成了领袖，因为他们生得逢时，并且知道如何利用时机。也许是这样。但是那些不愿为生活中荒唐的

悲剧所欺骗的人宁可相信帕斯卡的话：“如果克委巴特拉的鼻子当时长得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成为另一个样子”；他们宁可信奉伯特兰·罗素所信奉和所写的：“随它去吧，世界上发生的事由不得你，而是取决于赫鲁晓夫先生，毛泽东先生，杜勒斯先生。要是他们说‘你们去死’，我们就得死；如果他们说‘你们活下去’，我们就得活下去。”我无法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总之，我无法否认我们的生存是由少数人决定的，是由少数人的幻想和反复无常决定的，是由少数人的能动性和意愿决定的。这些少数人，通过他们的理想、发现、革命行动、战争行动，甚至一个简单的行动或对某个暴君的谋杀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和大多数人的命运。

当然，这是一个可怕的假设，这种观点触犯人的尊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成了什么？是一群在时而高贵时而卑贱的牧人手中的绵羊？还是一批充当配角的货色或是一片飘零的落叶？为了否定这个假设也许得信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决定一切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历史是由人民通过阶级斗争创造的。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现实生活并不能肯定这种观点。你会反驳说没有马克思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人能证明，如果马克思不诞生或马克思没有写资本论，约翰·史密斯或马里奥·罗西会写资本论）。于是，你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促成这样的转折而不是那样的转折的是少数人；使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是少数人；理想，发现，革命行动，战争行动都来自少数人；谋杀暴君的也是少数人。你不禁不安地自问，这些少数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坚强，比我们明智，比我们有胆量吗？或者他们既不比我们好，也不比我们坏，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一些不值得我们钦佩也不值得我们生气和嫉妒的普普通通

的人？

这个问题要追溯到过去，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而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只是学校强加给我们的那一套。谁能保证学校没有给我们灌输谎言？谁能向我们提供关于萨珊、凯撒和斯巴达克为人真诚的确凿证据？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的战绩，而对他们的人品、弱点、谎言、理性和道德却一无所知。我们手中没有材料可以证明维琴盖托里克斯是坏蛋。我们甚至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个高个子还是矮个子，头发是金黄色的还是褐色的，受过教育还是大老粗，是否与玛丽亚·玛达雷娜同过床；不知道圣路卡、圣马太、圣马可、圣约翰关于耶稣的传说是否真实。啊，要是有人用录音机采访过他，记录了他的声音、思想和语言就好了！啊，要是有人把圣女贞德在审讯中和在被烧死前的话速记下来就好了！啊，如果有人带着摄影机采访过克伦威尔和拿破仑就好了！我对耳闻传下来的记事，对发表得过早，又没有证据的报道投不信任票。昨天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无法核对的故事和无法与之争辩的臆断的小说。

今天的历史就不同了，因为它是在事情发生的同时写下的。人们可以在采访时对控制着世界和改变其进程的少数人照相，拍电影，录音；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马上加以报道，加以说明，并进行热烈的讨论。为此我热爱新闻工作，从事新闻工作。有哪一种别的什么其他职业允许你把正在发展的历史写下来，作为它的直接见证呢？新闻工作就有这种非凡和可怕的特权。理会到这一点后，很自然地会深感到自己的不足。我每当遇到一个事件或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见时总是焦虑不安，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眼睛、耳朵和头脑来进行观察、倾听、思考，以便从中理解一条蛀虫如何钻入历史这块木头中去的。我说我每进行一次采访都花



了心血，这并不言过其实。我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说服自己：去吧，没有必要成为希罗多德，你至少能带回一块对拼组镶嵌图案有用的小石头和对人们思考问题有用的情况。要是错了，也没有关系。

这本书就这样在7年中编成。7年中，我为“欧洲”周刊作了26次采访。我本着这种精神去访问我所要会见的人物，即：除了获取新闻以外，每次访问都力求弄清这些人物与我们普通人到底有什么不同。约见他们经常需要花九牛二虎之力。他们几乎总是以使人心寒的不予理睬或拒绝来回答我的请求（实际上本书中的26个人并不是我希望会见的全部人物），即使最后同意接见我，也要让我等上几个月以后才给我一小时或半小时的时间。当我终于见到他们时，我就得千方百计延长会见的时间。一旦见到了他们，便真相大白。我发现这些掌权者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人。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我很少遇到那种天生地应该领导我们和决定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掌权者，而是一些曾经为获得这个权力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斗争，并继续在斗争着的人。至于那些在某个方面使我喜欢并对我有吸引力的人，坦白地说，我思想上对他们是有保留的，内心深处对他们是不满意的。说穿了，我对他们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感到遗憾，我无法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去信任他们，因而我不能说他们是无辜的，更不能把他们当作同路人。

也许因为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权力；它能使某些男男女女意识到自己有权利或感到他人授予这种权利去指挥别人或惩罚不服从者。无论是暴君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无论是刽子手将军还是受人热爱的领袖，我认为他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不人道和可憎

的。也许我错了，但是人间乐园并不是在上帝告知亚当和夏娃将劳累终生和备受分娩的痛苦的那一天消失的。人间乐园是在亚当和夏娃发现了存在一位不允许他们吃苹果的主人，并在他们为了一个苹果而被驱逐出家园之后不得不在星期五禁止吃肉的部落里当首领的时候消失的。是的，在有人群的地方需要有管辖人群的人，不然就会出现混乱。但是在我看来，人类最大的悲剧在于他们需要有人管辖他们，需要一个头目。没有人知道这个头目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唯一确切知道的是你不能控制他，而他却要扼杀你的自由。更糟糕的是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但是人们还是以为它真的存在而去寻求它，并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感到有责任告诉读者，我坚信苹果生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采摘，星期五也是可以吃肉的。我更有责任要使读者知道，在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权力的同时，我却理解那些反对、谴责和拒绝接受权力的人，特别是那些反抗暴政的人。我把反对暴君看作是对人的诞生这个奇迹的最好利用；而对那些在暴政面前俯首帖耳、默不作声，甚至拍手叫好的人，我认为他们作为人早已名存实亡。我认为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是我与我的同志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在伯罗本尼撒半岛上见到的一件事。那是1973年夏季，帕帕多普洛斯还在台上，帕那古利斯带我去见一些抵抗运动者。我们所见到的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帜，而是3个字母OXI，希腊文的意思是“不”。这3个字母是一些渴望自由的人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时期在树上写下的。30年来，这个“不”字一直保存在那里，虽然日晒雨淋也不褪色。军政府的上校们曾经用石灰浆涂抹掉它。但是，象变魔术一样，雨水和阳光很快溶化了石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字母又顽强地、无视一切地

和不可磨灭地重新显露出来。

是的，这本书没有过高的要求，它只指望成为一段由30来位大人物提供的当代历史的直接见证。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象征性的意义。虽然新版本要比原来的版本丰富，但再版时我并没有重新加工。我只是在每一篇的前言中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有的地方只是改变了动词的时态，也就是把原来的现在式改为过去式。根据同样的原则我在新版中增加了于原书出版后进行的另外10次最重要的采访的记录。这10次采访的对象是朱里奥·安德雷奥蒂、乔治·阿门多拉、马卡利奥斯大主教、中央情报局的头子威廉·科尔比和他的对手奥蒂斯·派克、圣地亚哥·卡里略、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马里奥·苏亚雷斯和亚马尼。显然，时间会使我对某次采访的印象及对某个人的看法有所加深和发展。但是，如果我采用后来的观点来评论事情，就会使它们失去作品作为记录当时当地情况的文献的价值，使它们失去真实性，就象一张经过修改的照片一样。只是在象征性地结束此书前，在介绍关于对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的访问时，我认为有必要加一段有关他的事。这不是出于个人感情，不是因为阿莱科斯曾经是我生活中的伴侣，而是由于道义上的原因。他是被本书所揭露、谴责和憎恨的权力所杀害的。因此，在他被害后，我更希望读者阅读这本书，想到那个在伯罗奔尼撒岛的树上顽强地，无视一切和永不磨灭地重新显露出来的“不”字。

奥丽亚娜·法拉奇

# 目 录

原著序言.....	1
亨利·基辛格.....	1
阮文绍.....	28
武元甲将军.....	60
诺罗敦·西哈努克.....	75
果尔达·梅厄.....	107
亚西尔·阿拉法特.....	144
乔治·哈巴什.....	163
约旦的侯赛因.....	181
英迪拉·甘地.....	193
阿里·布托.....	225
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	256
皮埃特罗·南尼.....	275
朱利奥·安德烈奥蒂.....	303
乔治·阿门多拉.....	333
维利·勃兰特.....	367
海尔·塞拉西.....	393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418

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	445
威廉·科尔比.....	474
奥蒂斯·派克.....	504
马里奥·苏亚雷斯.....	527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	569
圣地亚哥·卡里略.....	590
埃尔德·卡玛拉.....	617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641
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	668

## 亨利·基辛格

这个人太著名，太重要，太幸运了；他被人们称为超人，超级明星，超级德国佬；他拼凑自相矛盾的联盟，签订无法实现的协议，使世界象他在哈佛大学的学生那样为之屏息。这是个不可思议的、难以理解的、实际上是荒唐可笑的人物。他可以在他想见毛泽东时就能见到；在他想去克里姆林宫时就能进去；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叫醒美国总统并进入总统的房间。在这个50岁、戴着黑边眼镜的人面前，詹姆斯·邦德的那一手黯然失色。此人不象詹姆斯·邦德那样开枪、斗殴或跃上奔驰着的汽车，可是他能建议发动战争或结束战争；他自认为能改变甚至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命运。那么，这个亨利·基辛格究竟是何许人呢？

象记载其他历史要人的书一样，也有不少关于他的书。《基辛格和弄权》记述了他的政治和文化生涯，这本书是一个曾同他一起在大学任教的人出于对他的钦佩而写的。《亲爱的亨利》则专门颂扬他的富有诱惑力的才华。作者是一位爱慕基辛格的法国女记者。基辛格从来不愿与他那位大学里的同事讲话，也从来不愿与这位法国女记者睡觉。一提起这些作者，他就做一个表示厌烦的鬼脸，并扬起他那肥实的手，打一个表示否定的手势：“什么也不懂”，“没有一点是事实”。他的自传倒是一部可供研究的

著作。读它的人都会对他感到敬佩。众所周知，亨利·基辛格于1923年生于德国的菲尔特。父亲叫路易·基辛格，是一个中学教师。母亲叫葆拉·基辛格，是家庭妇女。他的祖先是犹太人，亲戚中有14人死在集中营里。1938年，他同他的父母亲和弟弟瓦尔特一起逃往伦敦，后来迁居纽约。那时他才15岁，名叫海因茨而不叫亨利。当时他一个英文单词也不认识，但也很快就学会了英语。父亲在邮局当职员，母亲开了一家糖果饼干店。他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进入哈佛大学，并以满分毕业于该校。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施奔格勒<sup>①</sup>、汤因比<sup>②</sup>和康德。毕业后，他留该校当教授。21岁时去德国服役，被编入一支由通过考试选拔的青年组成的美军部队。这是一支人才辈出的队伍，其成员都聪明过人。因此，基辛格尽管初出茅庐，却被委派去组织克雷菲尔德市政府，那是一个毁于战火的德国城市。就在克雷菲尔德，基辛格对政治产生了热情。这种热情使他后来逐步成为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顾问，继而成为尼克松的助手。人们把他看作美国的第二号人物不是偶然的。但是，也有人认为不仅如此，就象在我采访他前后那些日子里流传于华盛顿的说法那样：“试想，要是基辛格死了会发生什么事情，理查德·尼克松会成为美国的总统？……”

人们称他为尼克松思维的保姆，给他们两人杜撰了一个刻薄的但却形象化的姓：尼克辛格。总统离不开他，作每一次旅行，参加每一项仪式，出席每一次正式宴会，度每一个假期，都把他带在身边；特别每当要作出决策的时刻，更少不了他。要是尼克松作出了使周围的人目瞪口呆的去北京的决定，那是基辛格使他

---

①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史学家（1880—1936）。

② 英国早期的经济史学家、社会改良主义者。

产生这个念头的；要是尼克松为缓和东西方关系决定去莫斯科，那是基辛格的建议；要是尼克松决定抛弃阮文绍而与河内签约，那是基辛格说服他走这一步。基辛格的家就在白宫。当他没有出去当大使或密使，没有当国务卿，也没有去签订什么协议时，他一清早就进白宫，直到深夜才离去。他甚至把换下来的脏衣服也装在纸袋里从容地带进白宫，但谁也不知道他送到哪里去洗（也许是送到总统的私人洗衣房里）。他经常在白宫吃饭，但不在那里睡觉，因为不能把女人带进去。他已经离婚九年了。他的风流轶事被精心地编成神话，但是很多人并不信以为真。无论是演员、戏子、歌星、模特儿，还是制片人、记者、舞女、女财主，他都喜欢。然而对此抱怀疑的人认为他谁都不喜欢，认为他所以这样行事只是为了耍花招，因为他知道这样能增加他的魅力，使他更有名望，杂志上会更多地刊登他的照片。就这个意义来说，基辛格是在美国被人们议论得最多，最出风头的人物。他戴的那种近视眼镜，他的那种犹太人的小卷发，他身上那种灰色西服和蓝色领带以及那种讨人喜欢的假天真的神态，一时都成了时髦，人们争相模仿。

象他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一样，此人一直是个谜。由于这个谜，他使人难以接近，难以理解。他不接受单独采访，只在官方记者招待会上发言。因此我可以发誓说，我至今还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他在接到那封我对它并不抱任何幻想的信以后三天就同意接见我。据他说，那是因为他读了我关于1969年2月在河内采访武元甲的访问记，也许是这样。但是在他表示了那个意外的“同意”之后，他又改变了主意，提出了接见我的下列条件：他在接见中将什么也不告诉我，而我得讲话；他将根据我所说的来决定是否接受我的采访。最后，他答应安排时间。1972



年11月2日，星期四，他如期在白宫接见了。他气喘吁吁地向我走来，板着脸对我说：“早安，法拉奇小姐”。然后，还是板着脸把我让进了他那陈设华丽的书房，那里到处放着书籍、电话、纸张、抽象派的画和尼克松的照片。进去以后他竟忘了我的存在，背着我，开始阅读起一份打字稿。我站在房间中央感到有点尴尬，而他始终背着我念他的打字稿。他这样做既愚蠢又不礼貌。但是这种局面倒使我有机会在他研究我以前先把他研究一番。我发现他毫无诱人之处：粗壮的矮个子，顶着一个羴羊般的大脑袋。我还发现他并不从容自如，并不那么自信。在跟对手打交道之前，他需要一些时间作临场准备，需要凭借他的权势来壮胆子，其结果是表现得极不礼貌。这是怯懦者的经常表现：色厉内荏。也许他本来就是如此。

他读完了那份打字稿以后（从他所花的时间来看，他读得相当仔细和用心），转过身来请我在长沙发上坐下，自己则坐在旁边一张比沙发高的安乐椅上，居高临下，开始向我发问，口气象一位教授在考问他所不信任的学生。这很象我在佛罗伦萨的伽利略中学读书时的数学物理教师。我恨那个人，他镜片后面那嘲弄人的眼睛紧盯着我时，我感到害怕，但他却以此取乐。甚至和那位教师一样，基辛格也有一个男中音的嗓音，准确地说是带喉音的嗓音。还有他坐在那里的姿势：靠着椅背，右臂抱着扶手，跷着二郎腿，以致上衣紧绷绷的，随时有绷掉纽扣的危险。如果他这时要使我局促不安那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学生时代的情景象噩梦似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以致我在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时都感到担心：“上帝，我答得上来吗？要是答不上来，他会让我留级的”。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武元甲将军：“就象我对您说过的那样，我从来不接受单独采访。这次我考虑接受您采访